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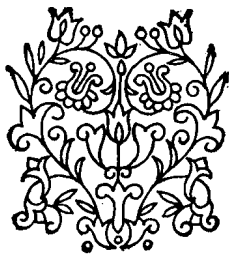
群 众 出 版 社



心 血

心 血

本 社 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目 录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习惯与改革·····	鲁 迅 (1)
拿来主义·····	鲁 迅 (3)

报 告 文 学

周总理和人民心相连·····	黄维钧 (6)
心 血·····	许 以 (24)
继母的故事·····	周宗奇 朱明媚 (38)
浪 子·····	理 由 (54)

小 说

水上民警·····	计永佑 (74)
艾丽之死·····	王贺军 (112)
背后是大海·····	郁 茏 (158)
七仙姑现形记·····	王东满 (172)
边防卫士·····	蔺鸿儒 (190)
这样的一个人·····	孟伟哉 (201)
鸪 鸽·····	勤 耕 (214)

诗 歌

七月的歌

- 献给党的生日……………魏 军 (228)
- 脚印, 形形色色……………顾 工 (232)
- 审判江青旁听小记……………戈 原 (235)
- 失去比喻……………邵燕祥 (236)
- 私泉橄 (方成画) ……………池北偶 (238)
-

评 论

- 用科学态度对待推理小说……………方 波 (239)
- 浅谈《刑警队长》……………叶咏梅 (248)
- 丰富多样 焦点在人……………王云缦 (251)
- 评《戴手铐的旅客》……………思 忖 (257)
- 读中国古代间谍史话——《间书》……………袁 贺 (261)
-

随笔·杂文

峻坂盐车我仍奋

- 怀念茅盾老师……………赵 明 (14)
- 迎春曲……………冬 麦 (265)
- 镜子仍不可少……………于浩成 (269)
- 漫谈警民关系……………刘恩启 (271)
- 情深意长
- 《戴手铐的旅客》上映追记……………于 洋 (274)
- 法网难逃……………周继胜 赫双林 (276)
- 在走私的背后……………文起衰 (278)
-

港台见闻

桃园盛开棠棣花

——中国乒乓球队在台北机场……李富荣 庄家富 (280)

旅港杂感……沈美娟 (286)

国际一角

密室奇案……[美]约翰·巴伦著 刘振恺译 (292)

“莫斯科之恋”的悲剧……长安译 (312)

封面设计……胡基明

封二 路 (油画)……汪洋

封三 破案之前 (摄影)……刘琦

封底 父与子 (油画)……刘毅勇

纪念鲁迅 学习鲁迅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书特收入鲁迅先生的两篇文章《习惯与改革》和《拿来主义》，以示纪念。

在纪念鲁迅之际，我们应进一步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质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

——编者

习惯与改革

鲁迅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象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

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拿来主义

鲁迅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还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

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象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周总理和人民心相连

黄维钧

九月初的北京站分外热闹，因为到外地上大学的青年们都在这个时候登程赴校。今年，我也挤在喧腾的月台上，为考上南方某著名重点大学的儿子送行。有整整三节车厢的乘客都是大学的新生，我被他们兴高采烈的精神所感染，心中涌出一股欣慰的热流。我默默地祝福这些时代的幸运儿，更希望他们懂得珍惜这样宝贵的机会，努力深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发车的铃声响了，儿子来向我告别。他说了一句话：“放心吧，我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生命的价值。”这句话别人听来颇感奇特，而对我来说，象投石冲开水底天那样，在心中激起不断扩大的回忆的涟漪。只有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初阶段有过一桩不平凡的经历，因而使他的生命具有一层特别的含义。知道了事情的底细，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了。

我的孩子出生于荒年之末的一九六二年。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孩子的母亲在上海，我的老家在南方一个美丽的城市。孩子降生后，她妈妈是集体户口，当地不同意给孩子落户；北京有关方面说，孩子户口跟妈走，所以也拒绝接纳；我老家所在的城市，由于孩子父母不在本地，拒绝得更干脆。它们的拒绝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却造成这样一个没有道理的事实：孩子降生，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粮食，没有牛奶，没有

糖，没有鸡蛋，以及其他一切凭本供应的食物。这不是他们不理睬这些，在他们死扣条文的背后掩盖着对人民疾苦的漠不关心。他们忘了社会的组成除了规章制度的维系外，还要有人与人之间的相爱；人与人之间除了公事公办之外，还要有同情与体贴。具体到我孩子户口这个问题，只要有一个部门有点急人所难，与人为善之心，认真负起社会保护儿童的责任，是不难解决的。

我把孩子搁在老家，天天为报户口而奔走，可是得到的是冷漠相待。我焦急忧愤，一筹莫展。挨过了三个月时光，老父来信悲怆地说：“孩子天天喂点米汤，瘦得皮包骨头，声音细弱如初生的小猫。户口再不解决，小命难保。”读到此处，我泪如雨下。我绝望了，同时也看清了这盘棋：时逢灾年，各处都想减轻自己的负担，谁也不愿接受这个幼小的生命。

虽然身临困境，我仍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忍看一个无辜生命饿死。如果什么人对性命攸关的事情，视若草芥，这是天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必须纠正。这样的事情一定有地方说理去。我决心为争取儿子神圣的生存权利而奋斗。但这只是一个信念，具体的出路在哪里呢？一片茫然。

我日夜思索着、探求着造成转机的办法。思考活动象一张伸展的网，搜寻着、捕捉着一切可供利用的机会。有时在路上，突然伫足而立，冥想起来。夜阑人静，独坐楼顶平台，仰望浩瀚星海，俯视阑珊灯火，寻觅着希望之光，耳边则仿佛不断传来“象小猫般”微弱的儿子的啼饥声，心痛楚得紧缩成一团。不松懈的思虑把每一个脑细胞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渐渐在惶急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了一条思路——具体部门求不动了，必须有一种极强有力的干预，才可能使问题出现转机——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亲朋好友中并无显赫之士。而要把这么一件普通的“凡人小事”的苦衷传达到很高的领导者心中；而能引起巨大关注，这个人一定心有全国人民，胸怀天下忧乐，而且要仁爱为怀，极富有同情

心。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应该有许多这样的人。但是我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和直觉的指引来确定我要求助的这个人。这个思路一旦明确，我的“意识流”有了方向。潜意识中一些闪光的记忆、印象浮现出来，自动集聚起来把我引向一个伟大的人物。

——在研读有关昆曲《十五贯》材料时，记得周总理批评一些党政机构脱离群众时曾说起过封建社会还有个堂鼓，击了鼓当官的就得出庭，现在见首长比那时还要难。我想，只有深知社会弊端，体恤百姓疾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想起不久前曾访问过内蒙来京演出的乌兰牧骑的同志，他告诉我到怀仁堂演出前，总理请他们到家里吃晚饭，总理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不特地做什么，赶上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到他家里后，炊事员同志端出来的是窝窝头和大白菜。这位同志告诉我，他发现大家进餐时神情特别庄严，有的同志噙着眼泪在吃。我感动了。我想，人民都在艰辛度日，虽身居高位，而不忍独享，愿与人民共忧患者，他对百姓疾苦一定知痛知痒，有切肤之感。

——一直保留在我脑海中的一件我亲眼目睹的事情，此时也浮现出来。有一次在原文联大楼礼堂看节目，我的前排尚有空位。开演以后，有一个人悄悄挤进来坐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周总理：看来事先未经安排，所以总理的邻座是个老汉。这老爷子是河北涿鹿县人，是一位勤杂工的父亲，探亲来京，住在文联大楼地下室里。关外的风沙使他的脸象杨树皮那样粗糙和多纹。从最近著名油画《我的父亲》你可以想象出这个老汉的模样。他此刻正以所有第一次看戏的人都有的那种新奇、专注的神情，目不转睛地在看台上发生的一切，两只手还紧紧抓住前排座位的椅背，说明他在为剧中人的遭遇使着暗劲。他出神了，根本没理会身边空位上坐下一人。保卫人员出于自己的职守，要那老汉离座。总理生气了，用严厉的口吻说：为什么要把人赶走，一起坐着看不是很

好吗？那老汉这时才回过头来，大约认出了总理，慌忙起立，总理一把拉住他那只青筋暴绽、粗大曲节的手，轻轻把他按在座位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位领袖人物对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特别受到感动。那一晚我压根儿没好好看戏，不时端详着总理，以至于总理旧呢子外套由于年久磨损而经纬毕露，衬衣领子已经补过以后又磨损了都看得一清二楚。

象一滴水就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一样，生活中有时伟大的真理却见诸平凡的细节中。总理的衣着和对老汉所表现的民主精神，把我平时想象中的高大的领袖形象与可亲可近的普通人的形象融为一体了。我的逻辑很简单，平等待人的人，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人，他的心与人民相通。当我为儿子报不上户口焦急万状之时，这些回忆与断想启迪我，我要求助的这个人就是周总理。我决意给周总理写信。

在执笔之际，我沉吟良久。我明白这件事的深浅：不管信写得多么委婉，总要表露对三个城市的公安系统的不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虽年轻，但已经经历过“反右”、“反右倾”等运动，对形而上学的政治上纲法是领教过的。信到了总理手中，我是放心的，但很有可能信被信访部门转到什么机关或者本单位，扣上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因为其中不能不说到孩子在挨饿），我就栽了。因此这封信要写得如果真碰上这样倒霉的事情，我也能设法自我解脱。但是这很难做到。但，顽强的“人性”：爱子之心，不顾一切保护下一代的本性，战胜了我的软弱和顾虑。我豁出去了。

终于落笔了。先写形势大好，再写三个城市自有难处，表示谅解（这并非由衷之言，是一旦出事用以自辩的伏笔），然后转到我遇到的困难，在写襁褓弱子嗷嗷待哺，嘤嘤啼饥时，才真情泻纸，笔下不由得哀怨凄绝。结语则落到我相信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置一个小公民的生死于不顾（存心软中带硬，反面文章正面

做)。信封上写了一个我也不知道邮局该如何投递的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收。

信是寄出了，心却悬在半空中。我想，信八成到不了总理手中。但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就这样希望着，期待着。

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个奇迹的出现是以使我大受惊吓为开端的。寄出信后的第三天（请注意只有三天），我在开会，走廊里有人大喊一声：“×××，公安部打电话找你。”我的心“格登”一下，下意识闪过一念：糟糕，坏了！一是我以为最坏的估计兑现了；二是我与公安部毫无干系，专政机关的最高当局找上门来，必无好事，事情闹大发了。大约我当时神色慌张，与会的同志相顾愕然。等我出门后，我听到他们在议论：他出什么事了？

我先定定神，顺顺气，然后拿起电话机自报家门。可是耳机中传来的是十分亲切的声音：“我是公安部，你写给周总理的信，总理已批转给我们，要我们设法解决。现在我们征求你的意见，你想把孩子的户口报在哪里？”我说：“我与我爱人分在两地，谁带孩子都有困难，希望把孩子户口报在老家。”电话中说：“好的，我们立即打长途电话与那里的市公安局联系。请你记下我的姓名与电话，有事你再找我。”事情办得那样干脆爽快、毫不含糊。我连声道谢，电话中那个亲切的声音却说：“不要谢，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此时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觉得热流顺颊而下，声音也咽住了。放下电话，我赶紧给老父亲写信，把喜讯告诉他。

过了两星期，父亲来信说：“户口报上了，但是粮食局不给粮食。局长说，就是报上户口，也不给粮食。”有户口就有粮食，这是制度。可是这个局长不知为什么此时无视制度的存在，存心进行刁难。但局长有权，我们无可奈何。我只得写信告诉父亲：“咱们只有采取‘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办法，多说好话多恳求，求局长开恩吧！”我没有立即再给公安部那位同志打电话，一是

觉得他已经尽到责任，并且解决了他职守之内该解决的问题；二是只要自己还能设法，不要得陇望蜀，尽量少麻烦别人。谁知就在我回信给父亲之后的第三、四天，公安部那位同志主动给我来了电话，询问问题是否已经解决。我如实相告。他说：“怎么能这样做，我给他们省里打长途电话。”

又过了约摸两个星期，老父亲来信说问题解决了，并且具体描述了经过情形：“派出所来通知我到粮食局找某局长办粮食手续，我兴冲冲赶去。通报以后，回话说：‘局长忙，你等着。’我在局长办公室门口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隔着玻璃窗望见他喝着热茶，翻着报纸，闲在得很。终于要我进去了，他眼皮不抬，愤然说：‘你们竟敢告到中央，好大胆子！’我气得发抖，说：‘我们原是谨小慎微的小民，你身为父母官，不体恤下情，不为百姓解忧，把人逼急了，狗急还跳墙呢！人要被逼到绝路，胆子也就大了，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一下轮到局长气得发抖了，他愣了半晌，扔给我一纸批发口粮的公文。原来他早就写好了，硬是要最后发发他当官的威势，罚我这些年迈人站两个钟头。他哪里晓得我一早只吃了一碗稀粥。”我的父亲是个被我母亲称做“老实之为笨”的极胆小怕事的小学校教书先生，竟然被这位局长挤兑出这么一番至理箴言，真可谓气极而勇，急中生智。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而公安部那位同志又主动打来了第三次电话，查询事情的结果。我说已经都办妥了，再三表示感谢。他说：“出现这样的事情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不值得感谢。你还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了。”他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可以向总理复命了。”我第一次亲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总理和他的下属之间这样的严谨的作风，深受教育。

还有一些连带发生的事情也值得一写。我中学时代一个同学，我知道他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但从未联系过。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他说，

部里的领导在大会上念了你的信，从落款上知道你的工作单位。不久公安系统开展了“爱民月”。父亲还告诉我在我老家那个城市，由于解决了我儿子的户口，因而有前例可循，一批类似情况的孩子都解决了户口问题。

还有一件花絮，至今想来还令人哑然失笑。当年我回老家省亲，父亲对我说报户口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以往派出所总是冷面相向的一位同志，此后一见到他就笑容可掬，有一次悄悄问道：“你儿子在北京当什么大官，竟然总理亲自过问，让公安部替你孙子上户口。”我父亲说：“官至二十二品，每月五百六十大毛。”那位同志满脸惊愕，喃喃自语地说：“这倒怪了。”他怪从何来呢？想必觉得身为总理竟为区区凡人小事操心，而堂堂公安部又一丝不苟地经办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在我，通过这件事，倒是上了一堂从未有过的深刻的政治课。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所包含的深意。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多少大事要处理。何以一封普通的群众来信能直送他的案头，他又那样重视，立即批转，而公安部又那样高度负责地处理这件事。这并不是我儿子个人的幸运。这说明着一个深刻的道理。马克思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而这个“人本身”是与生命共生共灭的。所以一个革命政权所有责任中最崇高也最起码的责任是保护人民。但是这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并不是所有大大小小左右着别人命运的人都真正懂得和铭记在心的。而为我那封信所能动的那颗伟大的心，不仅掌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且一定善于感知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悲苦与欢乐；人，在他心目中不是无关痛痒的概念。

正由于我儿子生命历程之初的这段遭遇，使我觉得我儿子的生命具有一层特别的含义。我希望他将来一定要成为祖国和人民有用之才，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为保护他的生命而作过努力的周总理和公安部的同志们。但是“四人帮”横行那些岁月里，我眼见儿